

芦家滩“口袋阵”打援 彰显粟裕军事才能

刘国璋



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但盘踞在华中的日军势力还很大，尤其是盘踞在车桥的日军，使我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抗日根据地难以连成一片。时任新四军一师师长的粟裕，站在战略高度考虑，决定发起车桥战役。

设置“口袋阵”

粟裕首先考虑怎么军事部署。他利用到新四军军部黄花塘参加整风和汇报工作的机会，带着少数参谋、测绘人员，有意识地选择路线，返回时“由天长之龙岗乘船过高邮湖北边，经黎城过运河，到平桥、泾口两据点间登岸……我们穿行于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往返500余公里，沿途察看地形，了解敌情。”回到苏中后，粟裕感到地图是缩小的战场。经过反复酝酿，又对有关疑点问题进行调查，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作战方案。粟裕根据车桥据点以及周边敌据点分布情况，决定：组成3个纵队：一个纵队打主攻；两个纵队打援。其中一个打援纵队重点放在阻击西边的来敌（因为西边的淮安、淮阴、泗阳、涟水日军与车桥日军是同一个大

队），泾口、曹甸等其他几个据点阻击由第三纵队负责。

在西线阻击中，粟裕还考虑援敌来势凶凶，武器装备又很精良，如靠硬拼硬，不仅伤亡大，还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只有“智阻”。他安排师侦察科长严振衡到车桥以西、涧桥北小马庄、石头桥以南、受河以西地区看地形，及时向粟裕汇报，粟裕根据地形特点，决定把阻击部队放在芦家滩。

芦家滩是一个住着30多户的小村庄，位于车桥西边约七八里，南边紧靠涧河。河宽20余米，水深流急，河岸险陡，不易徒涉。北边是一片坟地，坟地北边是芦苇荡，宽有500米，长约1000米。里面芦苇密布，泥淤深、能陷人。在河与芦苇荡中间，有一个狭窄的地域，形成一个口袋状况，淮安到车桥的公路就从这里经过。援敌要去车桥，只能沿这条公路来。进入口袋地域后，就施展不开来。置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有利于我军在这里歼敌。根据命令，担任芦家滩阻击任务的由新四军一旅一团、三分区特务营、泰州独立团的四营组成。兵力部署是在阵地前沿布设地雷，不让西来的援敌东进。为了不出意外，还安排五营在三营阵地东边筑了一道防线。在动员会上，团长、政委一致表示，誓与鬼子决一死战，

决不让敌人从我们阵地过去东援车桥。

“引狼”入口袋

粟裕考虑到，打援部队都埋伏在芦家滩一带，假如敌人知道了，会不会从周庄南边绕道东援车桥？真是这样，我军就来不及阻击，后果不勘设想。为了以防万一，便采取了“引狼入袋”的办法。3月5日这天下午3点多钟，第一批增援日军乘7辆卡车驶来，到了周庄。叶飞回忆说：“一团三营战斗警戒与敌接触后撤回，敌继续进至韩庄附近，对我假阵地实施炮击。我正面防御分队沉着隐蔽，敌未发现……”从这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三营警戒战士见敌之所以打了两枪，又立即撤回，实际是吸引援敌到“口袋”里来。

果然不出所料，援敌听到我方枪声，立即追赶，快到韩庄时，通过望远镜发现我军设置的假阵地，并用重机枪、掷弹筒进行一阵猛打，我正面防御分队沉着隐蔽，援敌看没有一点反映，以为阵地被摧毁，沿公路向我阵地步行前进，其余乘车驶进我三营阵地。当这批援敌到了离我三营阵地200米处时，突然遭到我军的猛烈开火，使敌措手不及，只好以一部向我还击，其余迅速下车，慌乱中跑到北边的坟地、土埂、公路侧坡等地方隐蔽，不知我军在这里埋下了地雷，开始遇到雷狂炸，后来敌人散开，引发雷又爆炸，一阵接一阵的炸，把援敌炸得血肉横飞，死伤60余人，挫伤了敌人的锐气。

急于往东增援的日军，在山泽大队长的协迫下，又用大炮、重机枪发起了第二次猛烈攻击，又被打垮。三营阵地面前，尸体七零八落地躺着。看到日军被打得鬼哭狼嚎、伤亡惨重，指战员们兴奋异常。至6时许，援敌先后来4批，均被我军阻击而未能前进一步。

重防“口袋边”

在布置伏击兵力时，师指挥部根据粟裕要求，提前做好战前准备。因北边是两平方公里的滩涂和芦苇，增援日军最有可能从韩庄向北绕过芦苇荡，再东奔往车桥。因此我军在韩庄、

芦苇荡北边（又被称为是口袋边），埋伏了主力部队，等待援敌的到来。

这时，师部已把注意力放到打援上，查明这些从淮安、淮阴、泗阳、涟水方向来的援敌，都是山泽部下。山泽凶狠好斗但刚腹自用。1943年8月3日，他的大队从安徽到达苏北淮阴县，负责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的“治安肃正”。旅团到达淮涟后，不断扩大范围，首先实施了六塘河战斗，接着又向淮阴县的徐家溜、古寨、丁集等地推进，企图控制六塘河、淮沭公路一线，切断根据地的东西战略通道，但都遭到我军和地方抗日武装打击，美梦一次次破灭。这次在增援车桥中，他佛晓就带领第一批援敌从淮阴上车，也许是因为风沙大，看不见远路，加上多处路段被我地方武装破坏，像蜗牛似的爬得很慢。山泽原以为在路上稍经战斗就能到达车桥，没想到遭到如此强有力的阻击，因此急电继续增援。

由于援敌多次攻击三营阵地没有得逞，但仍没放弃增援车桥，遂改由伪军带路，企图趁夜晚从我阻击阵地右翼涉涉偷越芦苇荡，再进至草荡东北奔袭车桥。但这早已在我军预料之中，一团七连和泰州独立团一、二连立即堵歼，逼敌一部逃向小马庄。小马庄三面河道险陡，一面则是毫无隐蔽的开阔地。三连三排长刘绍勇带领全排飞速越过庄北小桥，沿河岸绕到敌据房屋后面，搭人梯迅速爬上屋，揭开屋面一个洞，扔下手榴弹，炸得敌人哇哇叫。有的排打墙洞往里钻，与敌人作战。经过反复冲杀，残敌退到几间小土屋，我军随即边火攻边喊话。从小马庄侥幸逃出之敌，又被我一团一营二连击溃，零零落落，有被我军从淤泥里拉上来的，有窜到打援部队指挥所附近，被警卫员、通讯员捉到的，犹如丧家之犬，无法奔袭车桥。

由于增援日军始终没能向车桥前进一步，只好龟缩在“口袋口”的韩庄，这也有利于我军发起总攻。在夜幕降临时，狂风停了，我突击部队全面出动，迅速向西北前进。两路迂

回到敌人的来路，两路向援敌左侧面插过来。其中又分一路转到阵地前面，挡住援敌向东突围。援敌原准备的第3次冲锋放弃了，集中应付我军的突击，可是已经晚了，我各路部队已经在东、西、北三个方向完成了对韩庄之敌的包围。根据命令，晚9时许，冲锋号响彻云霄，我各路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压过来。二营六连首先攻入韩庄，并占领了庄子西头，在刀光闪烁中，日军横尸60余具。四连及特务营一连，分别由北、西两个方向攻入韩庄，奋战中的五连，也从庄子东边突破，形成四个箭头，把日军分割成四块，断绝联系，使其无法形成战斗合力，造成了被我分散歼灭的有利条件。一连在和日军肉搏时，几十个日军手舞刺刀哇哇大叫，冲了上来，我军战士随即扔出十几个排子榴弹，爆炸声好比一阵打雷似的，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了。整个韩庄到处弹片飞溅，刀光闪闪，日军尸体狼籍。此时，我军指战员又利用战前学会的日语喊话，开展心理战。高喊：“专打鬼子指挥官”！“专打山泽大佐”！由于是夜晚，援敌又不熟悉地形，听到这些喊声，心慌意乱。有3个日军听到喊话后，主动跑到我军这边来。我军也乘势追杀，进展尤为顺利。在车桥战役被俘的24人中，被俘日军茹志雄说，这些被俘的“主要出在增援部队里，从淮阴开出来的满载武装日军的7辆大卡车上”，首创苏中生擒日军新记录。尤其山泽大佐被俘（不久死亡，被日追升为少将）这是江苏敌后战场唯一有档可查的最高指挥官。

战后，一个日军炮兵中尉叫山本一山、一个大尉叫石川芳夫说，“你们在坟地埋设地雷的预谋，加上坟地周围设置的战壕，适时地掀开伪装，突然出现，这是你们战术胜利的绝妙计策吧？”他们讲话时的目光透出了敬畏的神色，连说：“你们的粟裕埃拉伊！埃拉伊！”意思是了了不起、了不起。

芦家滩打援的胜利，保证了主攻部队侧翼的安全，获得了“车桥大捷”，证实了粟裕判断准确、组织缜密、用兵有力，达到了预想的战役效果。

刘鹗：一位“特立独行的现代知识者”

刘德隆 刘 瑀

为刘鹗编纂年谱的念头萌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了30多个寒暑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实践，又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提供的难得机会，使这本《刘鹗年谱长编》能顺利地出版、呈现在读者面前。《刘鹗年谱长编》是“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组织并出版）中的一环。《刘鹗年谱长编》是笔者及父辈、兄弟姐妹两代人搜集、整理、研究刘鹗资料的一个小结。《刘鹗年谱长编》力图在前人研究刘鹗及其著作的基础上能够有所拓展、进步。

述刘鹗生平最早的文章是罗振玉的《刘铁云传》，写于1915年。以“年谱”形式记述刘鹗生平之著作有两本，一是蒋逸雪先生的《刘鹗年谱》，一是刘惠孙先生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蒋著《刘鹗年谱》，1980年1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全书58页，37千字，无序文，有“后记”。其“后记”全文照录如下：丹徒刘鹗，富有才艺，于版本、碑帖、音律、医药、水利，均能涉其藩而通其义，于古器物能鉴别真伪，于古文字亦能粗探其源。世但称其《老残游记》文笔隽永，似未足以尽之也。鹗生当清季，国事日非，外侮之入侵，主政之颛顼。迷阳却曲，土多忧虞。鹗则机敏有余，端谨不足。如策路、开矿，岂可厚非，惟多为权变之谋，竟忘经常之道，于是议论纷然矣。其间见仁见智，好恶不同，好者有溢美之嫌，恶者不免深文之消，掩长补短，厥失维钧。本谱务在据事直书，不隐恶，不藏善，力避高下随心，庶几褒贬自见。鹗固愆尤丛集，观其日记，与全然自欺者似尚有别。死已七十年，迄无定论，闡微探幽，权衡当理，仍将有待于来哲。鹗籍标丹徒，而实居淮安，余少曾旅食淮壖，中年移家京口，于鹗之事迹略有所闻。又承王献唐先生暨刘惠孙、魏绍昌、卞孝萱诸君以所知益我；近复蒙齐鲁书社提示修订意见。细

维成书经过，不能不深感他山之助也。一九七九年六月，蒋逸雪记于扬州师范学院北舍。《铁云先生年谱长编》，1982年8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全书178页，133千字，有“引言”和照片及附录多篇。其“引言”一述该书写作经过，二述刘鹗家世及刘鹗个人简历。“引言”全文8000余字，不赘。《刘鹗年谱》叙事简练，文字典雅；《铁云先生年谱长编》叙事详尽，文字通俗。两书风格不同，但尽显撰述学者之风，是编著者研究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启蒙读物”。《刘鹗年谱长编》是在前两部“刘鹗年谱”的基础之上的继续之作，我们尽力多角度地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发现的材料梳理、研究、编辑。

刘鹗的《老残游记》

《刘鹗年谱长编》欲以蒋逸雪先生“据事直书，不隐恶，不藏善，力避高下随心，庶几褒贬自见”之精神贯注于全书。全书尽量将各种资料有机地编录，或一语概括之、或据实简述之，均为一家之言，以为研究者提供真实的论著依据。

刘鹗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刘鹗生前，褒贬毁誉如影伴随，至盖棺亦未论定。1909年，刘鹗病逝于新疆迪化（今之乌鲁木齐），至今一百余年，对其一生的作为及思想探讨、争论仍绵延不绝。有关论著有数十种，论文则以千计，研究者仍然在继续发掘新的材料，希望将这一复杂的人物，呈现给感兴趣的读者。《刘鹗年谱长编》希望以真实的资料、客观的阐述，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刘鹗。但是因处世之不同、立场之不同，甚至根据相同的资料，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也会有不同的结论。见仁见智，自有个人的看法。

刘鹗是个普通的人。是晚清大动荡社会里

的一个有思想而身上又交织着各种矛盾的极具特征的人。刘鹗认识社会的第一任教师是自己的父亲刘成忠。在《刘鹗年谱长编》中，特别是“年谱”中的前二十年，收入了刘成忠的部分诗稿和文稿。这些诗词文稿从未被人所知，是研究刘鹗的第一手资料。刘成忠写下了自己对河流治理的心得，成书《河防刍议》；刘成忠点评了韩愈的文章，成书《韩文百篇编年》；刘成忠实录了自己与捻军作战的经过，存留了部分书信诗词，有《刘成忠杂稿》《吹台随笔》等。父亲的耳提面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刘鹗。刘鹗的河工事业、刘鹗的文学著作、刘鹗对革命的理解与对义和团的评价，无不强烈地带有刘成忠的思想烙印。对刘鹗人生观形成有重大影响的是太谷学派。太谷学派是清代道光宣间儒家思想的一支暗流，其学人或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最盛时期，有万人之多。太谷学派的思想代代相传，刘鹗就是太谷学派的第三代传人之基本。在《刘鹗年谱长编》中，记录了太谷学派的书信诗词，有《太谷学派的社会活动、太谷学派的人际渊源以及刘鹗与太谷学派从思想学术到生活经济方面的多种关系。了解了太谷学派才能理解刘鹗的人生观及其作为，才能了解刘鹗的桀骜不驯性格的形成以及他与周围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

近代历史、近代小说的研究者评价刘鹗为“畸人”“通才”……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刘鹗关心国事是，忧心民生，以养民为己任，对时局他不时地发出感慨，提出建议，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着自己的祖国。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刘鹗参与治理黄河，实践与理论并重，非但亲身河工且能著书立说，为后世所传诵。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刘鹗参与引用外资、创办银行、开矿筑路、创建工厂，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毫无畏惧退缩。从学术的角度而言，刘鹗精于岐黄，善于算学，既能继承前人之精华，又能不拘一格而有所发展。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刘鹗有小说、诗词的创作，有文字、音乐的研究。其著作面之广、角度之新颖，颇具特色。《刘鹗年谱长编》将刘鹗以上多方面的成就，形诸文字，以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刘鹗。

刘鹗是“畸人”“通才”之说并不为过。社会是刘鹗活动的宽广舞台。没有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的经历，就没有刘鹗的医学著作、文学著作；没有黄河的泛滥和治理黄河的实践，就没有刘鹗的河工著作、数学著作；没有晚清社会的大变革，就没有刘鹗开矿筑路的行为；没有了义和团的风云，就没有刘鹗慈善事业、文物收藏等种种轶事……大动荡、大变革的社会，成就了刘鹗的多方成就；新旧思想的交锋，使旧文化熏陶的刘鹗滋长了新的思想，中西文化的碰撞，使在一个较为开放的封建官宦人家出生的刘鹗，身上融合了多方的元素，接受了新的文明。于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刘鹗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现代知识者”诞生了。

在编著《刘鹗年谱长编》的过程中，我深觉有三难：其一，正史不录，资料匮乏。刘鹗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李鸿章、王文韶、张

之洞、张曜、程文炳等朝廷栋梁、封疆大吏与之相往来；梁启超、宋伯鲁、汪康年、吴德潇、吴保初等维新派风云人物与之相往来；吴汝伦、马建忠、罗振玉、乔树枬、廉泉等文化界的领军人士与之相往来。所不同者，以上人物均是有实际职务的官员，奏稿、电稿、稿稿留存较多，且多已辑录成集。而刘鹗虽有所捐之功名，亦有所谓“太守”“观察”等虚衔，但从无实职。因此在《刘鹗年谱长编》中更少了许多“官方文件”的来往，只能使用刘鹗本人的叙述和存在于近代报刊杂志的历史记录。刘鹗所拜从的隐于民间的太谷学派，曾有弟子万余人，甚至其中部分有相当职务，如曾任军机大臣、学部尚书的荣庆；曾任北洋大臣的杨士骧、曾护理陕甘总督的毛实藩等位高权重者亦成为其信徒。但百余年隐于民间，缺乏正史之记录，因此难于一一叙述清楚。其二，资料零散，难于搜集。刘鹗生活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印刷业大发展之时期，书刊报纸浩如烟海。刘鹗及其民间的师徒友虽正史所不载，但又时时披露于书报杂志。如周太谷之论述《红楼梦》、严复之评论《老残游记》，沈荇之埋葬大刀王五、张荫桓记录缉捕刘鹗……只词片语，足可证明其活动的时间、地点及其意义。但这只是点点滴滴、蛛丝马迹都极难于搜集以串联成线。

刘鹗的一生，有许多至今无法解开之“谜”。刘鹗与马建忠之关系亲密，但至今未见任何实例；刘鹗与王国维有亲缘关系，至今竟未见有只字往来；刘鹗与袁世凯之齟齬缘由，至今未能确实；刘鹗与袁凤昌之挚友亲情，至今无法解释。凡此种种种虽已搜罗爬剔，仍有诸多谜团纠缠不解。这些遗憾，只能留于后人去探索、去解决了。

其三，褒贬不一，难于尽录。百年来对刘鹗的争论时起时伏。

“刘鹗是洋务派”。

“刘鹗是保皇派”。

“刘鹗是汉奸”。

“刘鹗是反动政客”。

“刘鹗是文学家”。

“刘鹗是小说家”。

“刘鹗是行动的人”。

“刘鹗是好心的政治家，伟大的艺术家”。

“刘鹗是失败的改革者，成功的文艺、学术领域的开拓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晚清新型的知识分子”。

“刘鹗是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和慈善家”。

“刘鹗是甲骨学家，印学家，碑版学家，文字学家，钱币收藏家，旅行家，改革家，太谷学派研究家”。

“刘鹗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多才多能的文学家，收藏研究和整理古代文物的专家，百折不回的实业家”。

“刘鹗是一个失败的中国早期资本主义新式工商实业家，中国文化遗产杰出的保存者和开拓者”。



“刘鹗的主要贡献不在政治或文学方面，而在于学术方面。刘鹗是个畸人，他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个大有贡献的人物”。

“刘鹗是个杂家。在国势垂危的清末，刘鹗与所有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怀有一颗炽热的爱国爱民之心。他毕生以探索寻求救国之路，强民之法为己任，殚精竭虑，呼号奔走，虽屡屡失败，但他那种矢志不渝、百折不挠、为国奋斗终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缅怀和继承的”。

2007年《刘鹗集》出版之后又有不少评论文章发表于各种报刊，主要有《重现晚清通才传奇人生》《再现“通才”全貌》《重新认识清末狂士刘鹗》《特立独行的现代知识者》为题的十余篇，于是刘鹗又有了“通才”“狂士”“现代知识者”等评价。

以上略述前人撰写“刘鹗年谱”之沿革和编写撰写本“年谱”之点滴思考，作为“前言”以供读者参考。

